

# 老兵日記(1)

顏嘉德

民國 16 年 3 月 29 日，我出生在湖北省棗陽市，原名叫顏家德。分布在湖南、湖北、江蘇、河南，以及江西的顏姓家族是同一個族譜，大家取名字，都扣中間這個字。我回大陸去，只要說我是顏家德，就知道我是哪一代，我是從顏回算起第 82 代。民國 38（1949）年我來到臺灣時，部隊裡面同時有三個「顏家德」，一位來自江蘇、一位來自江西，而我是湖北人。其中，江蘇那位軍階比較高，他不用改名，我與那位江西人則被下令改名。上級寫了幾個名字讓我們選，都是音同字不同，於是我把「家」改成了「嘉」。當時從大陸來到臺灣的軍官，規定不能同名同姓。我的兵籍號碼是 085574 號，軍方為了便於管理，一個人配一個兵籍號碼，每張兵籍卡上的兵籍號碼都是不同名字。

我父親昌喜公，以農為業，是族譜上的第 81 世，在家中排行老大。他出生於 1893 年，當時還是清朝時期，所以他小時候是留長辮子的。而我小時候也留辮子，到了 12 歲才剃掉。由於我們村子是承繼唐朝的習俗，留辮子就是像在門神畫像上小孩子那樣，是小辮子，清朝男人才是大辮子，到民國的時候就不准留大辮子了。我父親在我 6 歲那年的農曆正月初六過世，他是得肺癆，長期過度勞動，太累了，那時候得肺病的人不少。

我有兩個姊姊、一個弟弟，我們家四個小孩子分別是家芬、家芳、家德、家福。我們的下一代是學字輩，我的大女兒叫學芬、二女兒叫學芳，我的兒子叫學忠。原本我還有個哥哥，但不幸夭折了，最小的妹妹也不到 1 歲就過世，本來是六個小孩，最後只剩下四個。那個時候有病沒辦法看，地方上沒有醫生，也沒有藥。我哥哥死了以後，下面是我大姊，因為兒

子死了，來了個女孩子，我大姊小名就取為「來子」，希望來個兒子，下面生的第二個又是一個女孩，二姊小名叫「換兒」，希望換個兒子的意思。那個時候小孩子不好養，家長都會把小孩取名叫小豬、狗子，或叫什麼東西的，取得難聽的名字，似乎就比較好養一些。

我的乳名叫石頭，為什麼叫石頭？我是民國 16 年生，那時候土匪作亂，好多地方到處都是土匪，他們到處搶劫，也到我們那個地方。那時我媽媽大肚子，土匪來了以後，我媽也去逃難，她逃到偏僻的村莊。人多她沒地方睡，大家都睡在露天裡，因為我媽媽大肚子，大家都會照顧一下，就讓她睡到磨屋裡面。屋裡面有個磨子，是用驢子、馬拉轉來磨麥子，可以做麵粉，那種磨子比較大。我媽媽是在磨屋裡面生下我的，因為磨子是石頭做的，所以我的小名就叫作「石頭」。現在我上一輩的親人們全都走了，我在大陸的同輩家人，只有弟弟的媳婦還在。

我是 3 月 29 日出生，這是農曆時間，那個時候農民都是使用農曆，即使現在許多臺灣老百姓也都是用農曆時間，公家機關才以國曆為準。像我們到臺灣來的這批老人，我們身分證上面的日期都是農曆，到臺灣來了以後，有很多證件資料需要更改，但需要有證明。在大陸上，鄉鎮或在城市裡的居民都有身分證，我們村子沒有身分證，沒有這些證明的話，資料都改不了，所以像我這種年齡的人，出生日期大部分都是以農曆記載。

那時候我們家鄉沒有戶口，沒有門牌，也沒街道名稱，我只知道小時候住的地方叫謝家下老灣，因為以前有個秀才姓謝。我們那一個山崗都是姓謝，上面有個大村莊是謝家上老灣，下邊我們這個村莊叫謝家下老灣，70%都是姓謝，另外 30%才是我們這些外姓。他們在清朝的時候就是地方上的大戶，臺

灣陽明山也有個謝家祠堂，他們的資料都可以查得到。

我出生在吳店鎮顏家崗，24 歲的時候才搬到謝家下老灣。那時候我們家鄉那裡的男人大部分都是疼愛老婆的，我的母親唐兆爛有四個姊妹，有大姨媽、二姨媽及三姨媽，我媽排行老四，我另外還有兩個舅舅。大姨媽住在我們前面的崗上，跟外婆同村莊，二姨媽嫁給謝家下老灣姓謝的，他們的土地比較多，但是我二姨父吸大煙成癮，家道就沒落了。我二姨父死後，他們的土地要賣，於是叫我媽去跟我父親講，因為她們是姊妹，姊妹們彼此好說話，於是就用幾個錢把土地過戶給我們種田，於是我媽媽就搬到謝家下老灣，二姨媽搬到烏金店街上去住了。

我媽媽搬到謝家下老灣之後，就把我的三姨媽也接到這個村莊來住。我的三姨父姓李，叫李大銀，我的二姊夫叫李樹正，上一輩的姊妹及下一輩都同住了一個村莊裡了。我們家鄉的習俗都是媒妁之言、父母之命，這一定要說親，這叫「親上加親」，老一輩交情好點的在一塊談，你有女兒，他的內人現在肚子大了，將來若生的是兒子，他們就在一塊結親家了，這叫「指腹為婚」。我兩個姊姊出嫁了以後，因為我弟弟還小，加上我們地方有小丈夫的習俗，男孩超過 18 歲，女孩子就不嫁給他了，而女孩超過 20 歲，也不容易嫁出去。所以我母親就叫我結婚，好有人幫她做飯。我在 16 歲的時候奉母親之命，和大我 2 歲的女孩萬氏結婚，當時是民國 32 年 12 月初八。

民國 10 幾年的棗陽還很落後，不像現在棗陽市已成為中國百大城市之一，有鐵路、高速公路及高鐵，建設得很好。我小時住的那個吳店鎮，現在也是湖北省的百大城鎮之一。棗陽在漢朝的時候是歸南陽管轄，諸葛亮就在南陽的臥龍崗躬耕，他所隱居之處的隆中則在襄陽，不過漢朝的時候，襄陽與南陽都是在同一個地方，而襄陽與棗陽都是歸屬南陽府管轄。棗陽是

到民國以後才劃歸湖北，棗陽跟河南之間有一條河叫唐河，因為那時候做生意的人都要過河住在旅店裡，河邊上有一間飯店，那裡經常累積了好多貨在做生意，於是逐漸變成了一個集鎮，這個集鎮就是後來的湖河鎮，湖河鎮在這邊靠湖北，在那邊靠河南。

棗陽比較有名氣的人物是東漢中興皇帝光武帝劉秀，劉秀的出生地就離我家幾百公尺，在我們村子前面。我常跟朋友開玩笑說，我們棗陽出了兩個名人，一個是漢光武帝，另一個就是我顏嘉德。劉秀出生的村莊叫皇村，他們兄弟三人都是種田的，這個地方的人們一直以來都是以種田維生。民國 10 幾年的棗陽，由於滿清政權才結束不久，地方上連個小學都沒有，軍閥間一直在打仗，情況跟清朝末年差不多，人民的生活沒什麼大改變，大部分人家都還是在種田，我們家也是務農為生，我們家歷代都是農民，老祖宗 10 幾代以來都是種田的，沒有讀書人。

我家大約有 70 多畝田，這些田地還算不錯，但主要問題就是水資源沒管理好，有時候天乾，有時候水淹，然而經常水是不夠用的。那時候在我們的鄉村，農人是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，雖然文化很落後，大家沒有讀什麼書，基本上人們的心地都很好，大家都非常合作。我父親死得很早，家裡田地很多，不過田裡的麥子卻都長得好好的。

村子前面有一條河，農民把那條河用土一節、一節擋起來，擋好了之後就成了水壩，這個地方存了很多水，就叫壩。壩裏面的水一到種田的時候，就會有三家農戶來取用，他們通常是五、六個人踩著一臺水車，我舅舅、姨父都會來幫忙踩水車。之後也會有朋友來割麥子、捆麥子，然後挑回家。農人用牛犁田，一邊犁田、一邊整地插秧，當時都是用人工插秧，我在家鄉時也都插過秧的。

我的家境狀況算不錯，僱了四個夥計，但是收成還是不夠吃。我在家裡會種田、種棉花、種高粱、種麥子，幹什麼我都會。我 14 歲時就主持我家農業的工作，我經常給這些夥計說計畫，明天要做什麼，這幾天要做什麼，他們就都會去安排。這四個夥計，有三個是河南人，我們請了一個夥計頭來給他們分工。這些夥計都是透過介紹來的，村裡有個老夥計是河南人，他會將話傳出去，說有河南人要找事情做，你們誰要？他們也都很忠厚，不會有什麼壞點子、不會做壞事。

夥計們在我們這裡做事，就跟在自己家一樣，對待我們家裡小孩也跟他們自己的家人一樣，所以做起事情也都跟做自己家的事情一樣，但是他們做了以後雇主就要給他們糧食，或拿兩畝地的收成也可以，這個收成的糧食是給夥計的。雇主跟夥計會簽約，一做至少就是一年，如果夥計中間走的話，介紹人要負責。約期到的話，還要繼續做就再簽約，夥計做熟了以後，工作就習慣了，知道什麼時候做什麼，就會留下來。我們家請的夥計一直做到我去當兵，大概做了四年多。

4 月份割麥子，大家都吃麵食。到了 8、9 月，開始割稻，大家就吃米飯，有麵也不吃了。雖然我們家的田地還算不錯，但一般來說，收成還是不好，農業改革成效很差，再加上天乾或水災，春天的糧食往往都是不夠的，此時我們常到野外去找野菜吃。8、9 月稻穀割完了，要把土翻過來，9、10 月要把田都犁完，把冬天的麥子種好。因為 10 月份都會下霜，天冷以後土才會碎，也就是結了霜以後，然後再化冰。土碎了之後，我們再用牛犁田，牛拉那個耙，我站在耙上面，牛就拉來拉去，就把全部地整平了。

整平以後，把溝開出來成一條一條的，就種麥子，種了以後還要耙一趟，就是要讓麥子下到土裡面去，不要留在表面，在表面的都叫鳥兒吃掉了。整田了以後，就不要管它，冬天是

最閒的時候，人都沒有事了。等到過農曆年前後會下雪，遍地都是白雪，堆厚厚的雪，看到都是白的，等到雪一化成水，麥子也出芽了。等到雪都化完了，往田地裡一看，到處都是青的，麥子都長起芽來了，所以農人的生活非常有趣。

冬天下雪，小朋友閒在家裡沒事做，沒有手工業要幫忙，我們的生活就只有農業。冬天時間就是準備肥料，肥料就是堆肥，就是掃地的灰塵，或是弄一些草皮，到處撿些草或豬糞、牛糞，堆起來後，上面再放水肥。發酵了以後，再翻個幾次，堆成堆，再發酵，最後就變成肥料。到過了年，等那麥子都長出來以後，就把這個糞挑到田裡去，灑到田裡面上肥。

我們的村莊很大，從南到北、坐西向東，有八間大門樓，我們也叫「八大門樓」。每一個門樓約有 80 公尺寬，為便於行人與排水，門樓與門樓中間，都有一條約 30 公尺寬的巷子。村莊很大，我住第二廂大門樓。農人心裡面都很好，比方說村莊上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耆老會為村人排難解紛，大家都聽他的，他是這個村莊眾望所歸的領袖，大家都會聽他調遣，分工做事。

冬天過後，農人們湊在一塊談潑春糞的事，準備哪一天潑哪一家的春糞，大家都主動安排好了，哪一家要潑春糞，大聲吆喝一下，全村能工作的閒人都來了，不管你家裡有多少糞，田有多大，只要你說哪一堆的糞要潑在哪幾塊田裡面，大家都分好組，幾個人擔這一堆，幾個人擔那一堆，分工分好大家就去工作，都不會送錯的。我記得我小的時候，我家的春糞在一個下午，三堆糞都清光了。這些來潑糞的人，做完事之後，就揹著自己的工具回家了，不是幫你工作以後，你還要管他們的飯吃，他們不要。明天又是到哪一家去，後天又是到哪一家去，因為大家都是農人，就在這個月中間，不會閒著，都專門天天做這些事情，這叫作互助。

我家門前有 11 棵棗樹，棗子樹長得很高大，樹幹大概都有 30、40 公分直徑粗，每年樹上長很多棗子。這些棗子樹有兩種，一種是婆婆棗，棗子很大粒，就像我們現在吃新疆棗那種很大的棗子。另外一種是古靈棗，小一點，比較甜。我家雖然有很多棗子樹，可是因為交通不發達，無法運出去賣。我們只留了兩棵棗子樹，我都用稻草編了繩子，再把這兩棵樹綁了草繩子，人家看到就知道這兩棵樹是主人留的。

沒有綁繩子的樹，我會在樹下邊放一根 50 公分長，四、五公分粗的木頭棍子，誰走到樹下面來，手摘不到棗子，就可以拿木棍朝樹上甩，敲到樹枝震動，然後掉下好多棗子，他們都撿去吃。但是綁繩子的樹枝即使斷了，掉在地上，也沒有人去撿，因為他們知道這棵樹是主人留的。另外，打棗子樹是不能用竹竿打，今年用竹竿打，以後就不會生棗子了。所以一定要用松樹或是用柳樹的木頭棍子，大家覺得好玩，朝上甩打那個樹枝，一搖晃，棗子就掉在地上了，不過我們的家鄉風氣好，民情很純樸，不會拿走主人所保留的棗子。

民國以後戰亂連連、軍閥林立，國家沒有在我們那裡設立學校，所以我們小時候都沒上學讀過書。不過村莊裡的有錢人會請教書先生到家裡來教他們的子弟，順便通知鄰近村莊，讓想要讀書的小孩子，自己帶凳子、桌子過去，就成為私塾，工資的話就由他們那些有錢人負責。他們給老師一些糧食，也幫他準備住的地方，然後跟前後村的人說，你們的小孩子可以一起來讀書，也不要你們的錢，反正他們請個老師教兩個孩子也是教，前後村莊要讀書的小孩子都來，我小時候在家鄉讀過兩年這樣的私塾。

在一個房子裡面，常有 20、30 個孩子在那大聲喊著：「子曰『學而時習之……』」，男的女的小孩子都可以一起來讀，不過當時只知道照著唸，不知道什麼意思。村莊裡幾個有錢的

166 人家，他們溝通好，今年上半年我負責，下半年你負責，明年上半年他負責。老人家分配好上課的地點、什麼時候在哪裡，這個教書的先生，只是負責教書。

我們當時是有課本的，我還記得國語第一冊裡有「人手足刀尺，山水田狗牛羊」。我到現在還會背第四冊第一課，「春風輕輕吹，吹到草根裡，草被春風吹醒了，草兒欣欣快長起。」我們還有讀百家姓、千字文、三字經、四言雜字等。我回大陸時候跟我們那些小時候一塊長大的人提起，他們現在也都還會背課。

我在村裡的私塾讀了兩年，但一張文憑都沒拿到。我 6 歲時父親就過世了，到 8 歲我便跟著母親、姊姊、弟弟，一起種田、放牛，後來也就沒辦法再讀書了。



民國 10 幾年以後土匪比較多，地方上也有農人沒有飯吃，農閒時到外邊去搶有錢人，回來他們就有吃的了。那些有錢的人，為了自衛，他們都有槍。我也有一枝槍，我們這個村莊上，夥計都揹著槍，輪流守夜，幾個村莊都連絡在一塊，看到有人在那邊守夜，在那邊站崗，土匪不敢進來。

那時候地方上的老百姓都是烏合之眾，沒有訓練過的，土匪少的時候，還可以把他們打回去，土匪多了我們就沒辦法了。地方上沒飯吃的人，出去搶別人，這種也叫土匪，把有錢人的小孩子拉走以後，限你一個星期內要送多少錢，不送錢來，就把耳朵割一塊給肉票的家人。我們村裡有位姜法乾被割了耳朵，他後來也到臺灣來，我們都還常在一塊，他是前臺灣兵工署的中將署長，現在住臺北市中山區。

民國 16 年 8 月以後，社會不怎麼安定了。拉票的事層出不窮，我小時候也躲拉票，天天晚上都要躲到田地裡睡覺，現在想起來真好笑。你看土匪來了躲拉票，日本來了躲飛機，長大了又躲抓壯丁。真是的，我經過這「三朵花」，可以說少年都是躲過來的。

軍閥是民國 19 年以前的事，軍閥跟我們每天生活的關係不大，我們每天種田，有一句俗話：「不管誰來當皇帝，我都是完糧納稅。」清朝以來都是這樣子，農人就是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我們那地方以前是馮玉祥的勢力範圍，馮玉祥是跟老蔣打過仗的，如果張學良沒有入關，天下有可能都是馮玉祥的。張學良入了關以後，就將軍隊駐守在馮玉祥勢力範圍的後邊，所以當張學良宣布支持老蔣的時候，馮玉祥就退回西北了。我們那時候種田，繳糧也不是直接繳給馮玉祥，我們老百姓是繳給鄉公所，鄉公所再繳給誰，我們就不管了！

棗陽跟隨縣之間有一條河叫淅川，地方話叫淅水，淅水的那一邊是日本人，這邊就是我們的軍隊，我家就是抗日的第一

線。日本軍隊在民國 27（1938）年入侵過棗陽，28 年、29 年及 30 年，連續三年入侵鄂北、豫南以及棗陽，這三次都叫會戰，鄂北是湖北北部，豫南是河南的南部。我們那裡有抗日部隊，這部隊是第一線，他們很緊張，但我們老百姓不知道什麼緊張，因為那時候我們還沒見過日本軍隊，日本軍隊在山那邊，但距離我家很近，老百姓已不敢種田。民國 27 年之後，日本飛機轟炸我們村莊，大廟及城鎮同時也都被轟炸，我們每個鄉鎮都被投過炸彈，最起碼都有兩三發炸彈。村莊遭到轟炸，我們小孩子讀書都移到外邊河堤上的樹底下。那時候我們村莊住的都是兵，這些都是張自忠的部隊，隸屬於李宗仁，李宗仁指揮幾個軍團，33 集團軍聽他指揮，李宗仁是第五戰區司令。

我們村莊之前是馮玉祥的部隊駐紮，馮玉祥離開了此地之後，下邊交給宋哲元，宋哲元交給張自忠，張自忠就是 33 集團軍司令。日本軍只是走在襄河以東，沒有渡過襄河，最後一次進攻，是快到老河口，快到南陽了，這是民國 34 年 4 月的事情。日軍並沒有進去襄樊，都在棗陽這邊，日軍來了三次，不過他們並沒有占領。以前我們打日軍與打共產黨不一樣，棗陽與隨縣中間那一條河就是一條戰線，線外面有日本兵，線這面全是中央軍。打共產黨不是這樣，戰線外面是共產黨，線裡面還是有共產黨。共產黨是普遍存在的，他們從地下發展起來，遍地裡都是，所以打日本跟打共產黨的心理基礎是不一樣的。

我們打日本有幾句口號，就是「人不分男女老幼，地不分東西南北」、「國家至上，民族至上」、「軍事第一，勝利第一」、「意志集中，力量集中」，目的都是為了打倒日本，因為日本是外國人，大家都要消滅日本，要打倒日本，那個時候生活苦，不過大家沒有怨言。我們以前都是親眼目睹日本兵的惡行，日本兵把懷孕的女子綁到樹上，拿刺刀劈開大肚子，再用刺刀挑小孩子扛到肩上玩，日軍的姦擄殺燒，都是我們親眼

看到的。日本軍隊在我們家鄉，燒毀村莊，也燒毀田中生長出來的麥子。他們到哪一地方駐防，那個地方就會吃大虧，那個地方的房子會被燒，人也被殺，年輕女子也被強姦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，不是編的。所以大家都很痛恨日本，假如日本殺人殺得少一點，沒有姦擄燒殺這些事情的話，老百姓可能就不會那麼強烈反日本了。

民國 27 年，日本侵犯到了湖北隨縣的唐縣鎮，跟中央軍在棗陽隨陽店南北之線對抗，當時我住在王家城謝家老灣，此地駐有軍隊，我家也有軍隊駐守。在抗日第一線的後方，會經常聽到砲聲，日本飛機也常來，不管是大村莊、廟宇、鄉鎮、橋樑，都被炸，通常是丟兩顆或三顆炸彈就走了。飛機來了，大家就躲到田埂旁邊，等飛機走了，又回田裡工作，這種生活大家都習慣了。不過部隊多了、時間久了，就要再徵糧供軍隊吃，增加百姓負擔，日本投降後人們常說，因為抗戰八年造成民窮財盡，就是這樣來的。

民國 30 年，家鄉天旱不雨，除了小麥穗黃有些收成外，夏季單靠池塘儲水是不夠種稻的，因而改種雜糧，但田裡也乾到不能發芽，農民都叫苦連天。不幸的是在 8 月又鬧蝗災，我家只種一塊四畝七分稻田，僅有這一點稻穀正是成熟待收割時，就被蝗蟲咬得精光。蝗蟲本來不吃稻穀和高粱的，但是這一次牠們都把穀子顆粒和高粱都咬掉，這一年很慘，農民沒有收成，竟有餓死人的情形。除蝗災之外，缺水也是一大因素，次年春天農閒時，村裡提倡挖堰清泥，希望多儲水以利農業，增加一點收成。

人生上一次當，學一次乖，農人過去沒見過餓死的經驗，現在有了。自民國 30 年之後，為預防天旱，要種一些不怕乾旱的副產品，如南瓜、冬瓜及地瓜，都是春天或夏天種的，收成後可以好好保存。另外還有多種些油菜和青菜，在食糧不足時

170 可以應付。我家鄉節氣、寒暑、四季皆分明，每年 11 月將麥子種下，到翌年 4 月即可收成，這中間幾個月都是天寒地凍，大雪紛飛。萬物冬眠期，農民正好利用閒暇，整理農具及施肥養畜，靜待春雷轟隆之後開始播種，3 月清明過，4 月麥稍黃，又開始忙碌，一年之計在於春，我們要做好春耕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的工作了。

棗陽成了戰地，中央軍為改善交通，修公路時占用我們家許多田地。一天軍隊調動，走到我們家稻田邊時，一個兵因路滑摔倒，是時我正在水田除草，一個軍官說，這個兵摔傷了，要我替那個兵挑子彈，這意思就是我被拉軍伕了。我笑著說對不起，還向軍官鞠躬，軍官仍要我挑子彈。我在想，平時有人常說「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說不清」，這本是他自己摔倒，怎能怪我呢。我擔著子彈走了，夥計們都看著我，他們一定在想，我是被拉去當兵了，那時我才 14 歲，長得真像大人。

可是我也在想怎樣逃走，部隊走一程後便在路上休息，我先取得那位軍官的信任，我說穿這種衣服不好看，給我一件軍衣。又走一程到王家城南門，部隊休息要煮飯吃，之後再繼續行軍，連長派我出去找做飯用的柴，我送回來一捆，說還有一捆要去拿，於是我藉機離開軍隊，一跑四公里，回到家正好趕上夥計們在吃飯。我媽媽聽夥計說我被軍隊拉伕走了，一面做飯，一面哭。當她看到我笑嘻嘻地站在她旁邊，她又高興地笑了，還在擦眼淚呢。他們都問我是怎麼跑的，我做了一個跑步的樣子給他們看，大家（夥計、媽媽、姊姊、弟弟）都笑了，還說我是個「小鬼靈精」。(未完待續)